

# 全球化時代的“激進主義”

## ——來自歷史社會學的關注

[英國]克雷格·卡爾霍恩 / 郭台輝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英國倫敦；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中國廣州510631)



郭台輝 / 克雷格·卡爾霍恩

**[摘要]**歷史社會學作為一種方法如今已廣泛運用到具體領域。在歷史社會學看來，社會歷史的變遷與激進主義之間有着剪不斷的關聯，但激進主義的形式也是不斷變化的。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激進主義在全球範圍內主要表現為民族主義。激進主義並不能夠涵蓋抗爭政治的所有內容。有些抗爭政治並非是激進的，而是改良主義的。祇要存在新的全球化與新的聯繫，就會有更多的衝突；對於具體國家來說，就會產生強烈的民族觀念。僅僅以“全球化”為視角，是無法瞭解“民族”在全球化時代是何發揮作用的。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產生了各種把人們

關聯在一起的多層次認同，增加了個體認同與世界認同的競爭性挑戰，但所謂的“世界主義”不過是一種幻覺或一種神話，它祇是把整個世界想象成為世界主義，似乎民族國家正在消失，似乎人類祇有一個世界體系。民族主義、族群、宗教、語言、意識形態，每一個都可以是整合與分裂的基礎。這就涉及外部國際環境、內部制度設計與教育政策，涉及如何把人們強烈的事業理想融入到一個更大規模的結構中。從世界範圍看，如果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對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未來發展與夢想有所阻礙的話，他們必然會對過去的生活產生更大的懷念與鄉愁。

**[關鍵詞]**歷史社會學 激進主義 世界 中國

**[作者簡介]**克雷格·卡爾霍恩（1952—），男，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華茨卡市，1980年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任紐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公共知識研究所所長，2012年9月被聘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主要從事比較歷史的社會學理論研究，擅長把社會、政治、文化因素結合起來解釋由激進主義推動的歷史變遷，代表性著作有《階級鬥爭問題：工業革命期間大眾激進主義的社會基礎》、《社會學》、《批判的社會理論》、《民族主義》、《民族有作用：公民身份、團結與世界主義夢想》、《激進主義的根源：傳統、公共領域與19世紀早期的社會運動》等。

郭台輝（1973—），男，江西省萬載縣人，政治學博士，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世界史學科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歷史社會學、概念與概念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齊格蒙特·鮑曼思想中的個體與政治》。

**Title:** Radic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Abstract:** Historical sociology, as an approach, so far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all specific fie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adicalism, while the forms of which are variable. Radicalism appears in the form of nationalism since the 1990s. As a paradigm of analysis, radicalism does not cover all form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some of which are not radical but reformist. The existence of new globalizations and connections will lead to more conflicts, bringing up strong national pride to some modern states.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realize how nations play their rol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mer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ization is to create multi-level of identities connecting people together, thus increasing competitive challenge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lobal identities. However, the so-called “cosmopolitanism” is only an illusion or a myth. It visualizes the globe to become “cosmopolitanism” and get united into one system whereas the nation states seem to become vanished. Nationalism, racism, ethnicity, religion, language and ideology can all be the foundations for integration or separation, depen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ducation policies, as well as on how to integrate the career ambitions into a larger scale of framework. 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ything obstruc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ambition especially of the youngsters will inevitably cultivate a greater sense of memory and nostalgia of their past lives.

**Keywords:** historical sociology, radicalism, world, China

**Authors:** Craig Calhoun received his PhD from the Oxford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is the Director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is main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ological theory orienting to comparative history. Guo Taihui is a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He is now th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world histor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studie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concept and conceptual history.

## 一、當“歷史社會學”本身成為問題時

**郭台輝：**克雷格先生，我注意到，無論在原則上還是方法上，歷史學與社會學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方面，古典社會學家如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韋伯（M. Weber, 1864—1920）、涂爾干（É. Durkheim, 1858—1917，也譯為“迪爾凱姆”、“杜爾克姆”）等對歷史問題有着深刻的研究，並且在歷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另一方面，歷史學家諸如“年鑒學派”也充分吸收社會科學的諸多理論來理解歷史。具體來說，歷史學與社會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由此出現了“歷史社會學”，甚至進一步擴大到所有社會科學學科，即所謂“歷史社會科學”。然而，無論是作為一門學科還是一種方法，“歷史社會學”都不斷受到來自正統史學與主流社會學的批判，在20世紀90年代還出現了文化與語言的轉向。在美國，“歷史社會學”內部也掀起了一股方法論之爭的浪潮，諸多少壯派的學者都參與其中，您也是這場爭論的主要參與者。在《歷史社會學中的解釋》<sup>①</sup>一文中，您特別指出，歷史社會學家之間關於方法論的爭論，主要體現在歸納與演繹之間的分割。現在，十幾年過去了，演繹論與歸納論之間是吵得更加不可開交呢？還是彼此相互融合並找到了一種解決辦法呢？

**克雷格·卡爾霍恩**（以下簡稱“卡爾霍恩”）：坦率地說，兩者都不是。因為，爭論已經不那麼熾熱了，兩派之間都變得心平氣和了。但是，這是通過對其他方面的關注來簡單替代的。所以，不是找到了解決爭論的辦法，而是僅僅轉移到其他議題上了。現在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可以同時既做歸納研究又做演繹研究，並非祇走某一種研究路徑。所以，對於十年前發生的那場歸納與演繹的爭論，我祇能在此總結道：“我們可以同時學習‘歸納’與‘演繹’兩種方法，而不應該過分誇大兩者之間的對立。”

**郭台輝：**然而，在這場爭論平息的背後，我認為存在更大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過哈佛大學的巴林頓·摩爾(B. Moore)與其弟子斯考切波(T. Skocpol)等人的努力，在美國社會學界興起的“比較歷史分析”轉而成為了社會學這個龐雜學科的一個子領域，而且在學科建制上既完備又獨特。在您看來，究竟是這個領域所包括的廣泛主題不同於社會學其他子領域的具體主題呢？還是因為它試圖結合“比較”與“歷史”兩種研究方法呢？據我觀

<sup>①</sup> Craig Calhoun,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 (1998): 846—871.

察，許多人進入比較歷史社會學領域是為了學習一個具體的主題，但結果是，歷史社會學家們似乎對彼此的方法和理論並不瞭解，也沒有興趣。您又是如何看待這種奇怪的現象呢？

**卡爾霍恩：**“歷史社會學”是歷史學與社會學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與領域，學術界這股相互結合的熱潮成為美國歷史社會學在20世紀70—80年代復興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而且，歷史社會學顯得非常有活力，把許多領域都統一起來。然而，如今它已不再那麼顯赫了，僅僅是許多學科關注的一個子領域，諸如歷史社會學、歷史人類學、社會史、文化史等等，而且這種關注也並非是一種潮流和運動意義上的關注。儘管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聯是理所當然的，歷史社會學如今也被上述領域所理解和接受，但它已經不再是為了讓各種知識走到一起的興奮中心了。內在的異質性越來越大，所以就出現比較研究的諸多不同議題；而且，它已經不總是歷史的，更被當做一種方法。所以，斯考切波及其學生們主張用一種做比較的具體方法，不管是歷史的還是當代的，都運用約翰·密爾（J. S. Mill, 1806—1873）的比較差異與共性的觀點來指導其研究。他們的研究議題更多的是比較方法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對於歷史社會學家和更為普遍的歷史社會科學家們來說，都類似於斯考切波這種做法。當然，也存在一種解釋社會變遷的理論研究。我們之所以能够接受查爾斯·蒂利（Ch. Tilly, 1929—2008）提出的“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sup>①</sup>，就在於他的研究試圖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他的研究告訴我們，如果不瞭解變遷的長波段模式，就將錯過很多東西。我認為，這是仍然保留在歷史社會學中的最為核心的東西。你從邁克爾·曼（M. Mann）、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非常有意義的是，歷史社會學與兩個問題緊密關聯，一是所關注的社會處於何種狀態，二是它如何變遷至今的。其實，歷史社會學應該與理論緊密相連，應該帶你進入到如何理解當今大變遷這個問題中去。例如，當今資本主義以及現代世界體系發生了何種變化？它與金融危機、與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快速崛起是什麼關係？如果你沒有歷史的視角，你就無法解釋這一點。所以，歷史社會學的訴求在於，彌補傳統的社會學在缺乏一種歷史視角時可能會對事情作出的錯誤判斷。不過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社會學應當具有歷史的眼光，在某種意義上也需要一種開闊的國際視野，但不一定一直要用常規的比較方法。例如，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研究，確切地說，那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社會學，即使他的研究非常具有國際性和全球視野。

**郭台輝：**您似乎並不滿意歷史社會學在美國社會學會中這樣一個分支地位，而是想提出，它應該成為反對主流社會學的一種武器。這對於歷史社會學家來說，是否可能建立一種普遍理論和標準的方法呢？是否有必要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更為制度化地關聯起來呢？

**卡爾霍恩：**我認為，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關聯起來是非常重要的，但關鍵在於把理論研究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而不是沒有理論分析地僅僅描述歷史現象，也不是祇有一個簡單的、普遍的、抽象的理論；恰恰相反，普遍的理論必須是從不同角度的透視和爭論中得出的，尤其要經得起歷史史料的檢驗。所以，三十年前在馬克思主義與韋伯主義者之間關於階級問題的爭論不僅僅是立場不一致，而是一場真正的富有理論、歷史與現實價值的爭論。通過這場爭論，可以讓人們做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事物。因為，我們的研究目的不僅是建立一個抽象的普遍理論，而且還要發現更好的方式來解決新的問題和新出現的想法，而這祇有從不同的理論陣營中纔能得到不同的啓示，這意味着彼此之間要有爭論。現在年輕一代的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在歷史與理論之間建立各種聯繫，這是一種非常有深遠意義的做法。比如，充分利用布迪厄（P. Bourdieu, 1930—2002）、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華勒斯坦以及其他思想

<sup>①</sup>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



家的理論來解釋宏觀或微觀歷史過程。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代際更新和學術傳承。20世紀70年代是一個高峰，很多宏大理論與宏觀歷史結合在一起來研究討論；但到90年代衰弱了，成為一個低谷；如今又開始有所回歸。當人們



布迪厄



福柯



華勒斯坦

努力去理解社會中的一些新鮮事物時，學術方面就會出現一種更新和復興。例如，在歷史研究領域就興起一股新的全球史的研究，不僅僅是比較，而且是相互之間的聯繫。而此前的研究大都是將不同民族的歷史組合起來：中國歷史、印度歷史、英國歷史、美國歷史，等等，人們在這些不同的地方與區域史之間似乎看不到一種相互關聯的整體模式。現在，人們對“聯繫”的重視在歷史研究領域中已經出現真正的改善。比如，在最近二十年裏，許多關於“帝國”問題的研究，包括長距離貿易模式、世界體系、城市史等等，既探討帝國模式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又把不同地區的人們關聯在一起。所以，我個人的研究也受到這種新歷史研究的極大鼓舞，我希望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們重視與歷史學的聯繫。

**郭台輝：**這麼說，您對當前歷史社會學的發展還是比較樂觀的。我還想進一步追問的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在德國首先是由歷史學界發起的，在法國也得到歷史學家的推崇與運用，但還沒有像美國這樣，把歷史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和專業來對待。所以，您能否比較一下歷史社會學在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制度化程度？

**卡爾霍恩：**的確，歷史社會學在美國的制度化程度是最明顯的，但把它作為社會學中的子領域將來會付出代價的。相比較而言，德國的情況是最好的，他們重視歷史的深度與社會理論背景的作用。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在美國，所謂的歷史社會學這個新的研究領域，與之相對應的機構是美國社會學會的比較歷史社會學分會，這可以視為制度化的承認，但美國絕大多數社會學家們的歷史知識與歷史感都很薄弱。美國人普遍不研究歷史背景，也不重視與理論聯繫。而在德國，不存在諸如歷史社會學這種非常專業化和具體的學術分工，制度化程度也不強，但他們所有的社會學家都有廣博的歷史知識做基礎，“歷史社會科學”也首先是由歷史學家提出來，並有意識地吸收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概念。

法國、英國則介於美國與德國之間。與美國相比，英國在制度化程度方面顯得較弱，但與歷史學科有着更緊密的聯繫。有些人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比如邁克爾·曼，他是長期在美國社會學系任教的英國人。在法國，雖然有不少的社會學家是在做歷史研究（包括諸如布迪厄這樣的早年很少關注歷史的著名人物），但法國根本就不存在制度化的歷史社會學。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有人曾批評過布迪厄，認為他在歷史闡釋方面比較欠缺。這使得布迪厄在整個90年代對這方面的工作投入很多，直到他去世之前，已經撰寫了許多非常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著作。所以，法國的歷史社會學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領域，而是社會科學更大範圍的一部分。也有人像布魯諾·拉圖爾(B. Latour)<sup>①</sup>那樣，並不是一名歷史社會學家，但他做了很多歷史研究，以此成為他的社會學研究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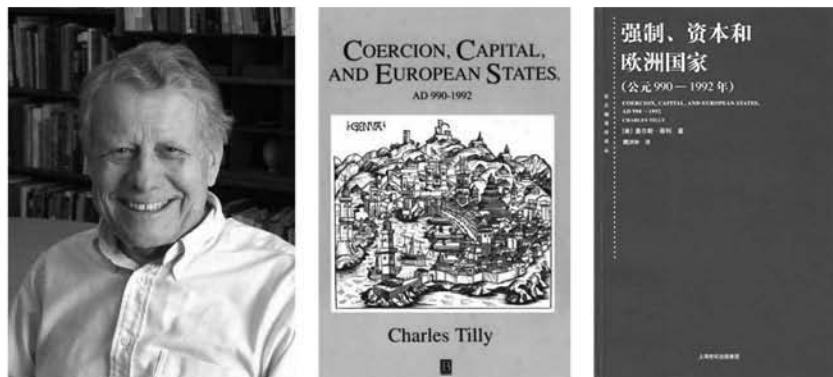
**郭台輝：**看來您更喜歡歐陸的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的關聯方式，這種關聯並不是用制度

<sup>①</sup> 布魯諾·拉圖爾(B. Latour)，法國科學哲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家，與布魯爾(D. Bloor)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人共同創立與發展了科學知識社會學。他們的理論對傳統的科學哲學思想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同時也創造了哲學與社會科學相互聯繫的一種新方式。

化來承認的，而是學者的一種主動意識。但是，這種關聯不同於實證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結合。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兩種關聯是互補的，因為社會科學具體的技術手段與方法需要社會理論的指導。您似乎對後一種結合不太感興趣。我覺得，“歷史社會理論”與“歷史社會學”可以冠之以“歷史社會科學”，使得史學理論與社會理論之間得以交織，而實證史學與實證社會科學也可以相互借鑒。我們知道，出身於社會學的查爾斯·蒂利是美國學術界較早提倡“歷史社會科學”的，而且在這兩方面做得都非常好，是少數能得到史學界公認的學者之一，是真正能打通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壁壘的學者。他五十年來一直關注同一個主題即社會運動或後來提倡的“抗爭政治”，集中於同一個區域即以法國地方社會為焦點的西歐，對歷史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您已經為“社會科學史學會”專門設立了一個“查爾斯·蒂利獎”<sup>①</sup>，還對查爾斯·蒂利及其在社會運動的同行們做過一個綜合評價<sup>②</sup>。您能否具體談談他們在方法論上對社會科學的貢獻？

**卡爾霍恩：**謝謝你的補充。我的確很少搜集第一手史料，也很少運用社會科學具體的技術手段，祇是在社會理論層面盡力關聯史學理論。這是個人的學術訓練與興趣使然。查爾斯·蒂利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社會學家，他把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到解決歷史問題之中。他既做歷史研究，也做定量分析，還利用官方文件與報刊，發展出一整套方法來分析“抗爭”以及其他事件的頻率，從而得到一個拓撲結構的發展過程。他與他合作研究的團隊拓展了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使人們既能够看到特定事件如集體行動發生的過程、模式和歷史，也能在某種程度上看到如國家長時段的形成模式和轉型過程。所以，他可以躋身於20世紀後半葉以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行列。

當然，由於他的研究是一種結構性的研究，所以，他在結構主義層面的成就非常顯著，對研究具體事件的方法論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對“歷史社會科學”有巨大影響，但他的影響主要是在社會運動方面。其實，他也寫過非常卓越的著作如《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sup>③</sup>



查爾斯·蒂利與他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英文版、中文版）

來考察上千年的社會變遷過程，但在大規模社會變遷研究方面並沒有太多的追隨者。相反，他的追隨者祇是研究非常具體的社會運動及其動力機制，這在主題與視野上顯然狹隘了許多。究其原因，一部分可以歸結為追隨者缺乏歷史研究的基本訓練，局限於社會學範圍而付出的代價；另外一部分則是一般人很難做到宏觀大結構與微觀小區域、長波段歷史與具體事件緊緊地關聯在一起。所以，他是學術界的一個奇迹。他與西德尼·塔羅(S. Tarrow)、道格·麥克亞當(D. McAdam)在斯坦福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組織的研討會，是在學術制度上的最重要創新。在那裏，他們把許多優秀的學生吸引到一起，而不在乎誰是真正的導師。他們的研究特色在於，分析那些獨特的、彼此分割的、小規模的社會抗爭與運動事件，不管這些事件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是美國的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他們甚至對整

① Craig Calhoun, Welcoming Remark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 (Fall, 2010).

② Craig Calhoun and Andreas Koller, “Charles Tilly’s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009): 333–339.

③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Wiley-Blackwell, 1990); [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與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魏洪鐘譯。



個研究領域重新設計，使之成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領域，祇是這些具體的抗爭分析並沒有與蒂利回答的宏觀歷史問題關聯起來。所以，這就存在兩個蒂利或者一個蒂利的兩面性。社會學的大多數學生與學者都祇追捧或延續蒂利的一個方面，而忽視他的另一面。

## 二、作為世界問題的民族主義

**郭台輝：**在討論了歷史社會學的基本問題之後，我們現在把話題轉到您具體研究的領域。從您1980年的博士論文《共同體、階級與集體行動：工業化英格蘭的大眾抗爭與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理論》（Community, Cla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Popular Protest in Industrializing England and the Theory of Working-Class Radicalism），到您第一本著作《階級鬥爭問題：工業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社會基礎》<sup>①</sup>，再到您2012年出版的《激進主義的根源：傳統、公共領域與19世紀早期的社會運動》<sup>②</sup>，可以看出，您三十多年來一直都在從事激進主義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不僅如此，據說您在大學時代還是罷課與反戰運動的激進先鋒？您的激進主義是否包括蒂利他們所討論的抗爭政治？

**卡爾霍恩：**我在青年時代的確比較激進，喜歡參與各種抗爭運動，這些經歷對我後來的理論與歷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實踐基礎。但學術研究上的激進主義畢竟不同於實踐中的社會運動，更需要理性與思考，更少激進與衝動。“激進主義”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相對於社會的主流觀念與行動而言的，因此，它是變動的，不能單獨界定的，需要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不斷轉換內涵與主題。我的博士論文關注的是19世紀的階級鬥爭，但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激進主義在全球範圍內主要表現為民族主義，因此，我最近二十年多來主要是關注民族主義問題。同時，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世界主義也是激進主義的一種新形式，由此把共同體與社會團結問題帶出來了，這也成為我關注的主題。

我不認為激進主義能够包括抗爭政治的所有內容。有些抗爭政治並非是激進的，而是改良主義的。人們或許有很多主張，但不一定喜歡激進主義關注的宏大變遷，而是關心小問題。所以，抗爭政治祇有一小部分是關於實質上的激進轉型。我想盡力做出區分的是：在一個體制中，抗爭政治的哪一部分提出了激烈變遷的可能性，如革命、經濟的徹底變革或其他更深層次的東西。因為，絕大多數的抗爭政治都是屬於改良主義的範疇。更深層的歷史分析有利於克服研究者的一些偏見。比如，為了理解當今的局勢，我們需要理解宗教。為什麼有時候會產生激進的宗教運動？如果我們祇是從20世紀或者祇是從啟蒙運動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就會忽略以下事實：宗教有着漫長的歷史，宗教有時候是相對保守的，有時候又是相當激進的。當然，我深入關注的還不是宗教運動的激進主義，而是民族主義。

**郭台輝：**我理解您從研究工人階級運動到研究民族主義之間的跳躍，您是把兩者都置於激進主義的框架下來理解的。那麼，您對民族主義這個主題感興趣的內在動力是什麼？您如何評價“民族主義”？

**卡爾霍恩：**我對“民族主義”感興趣，與1989年在東歐、蘇聯、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歷史變化有關。許多人把這種變化僅僅闡釋為全球化，認為世界到處都在發生同樣的變化，使得我們所有人都彼此聯繫在一起。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是錯誤的。如果我們不是以那麼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來觀察這個世界，就可以看到：祇要存在新的全球化與新的聯繫，就會有更多的衝突；對於具體國家來說，就會產生強烈的民族觀念。以中國為例，自1989年

<sup>①</sup> Craig Calhoun, *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sup>②</sup> Craig Calhoun, *The Roots of Radicalism: Tradi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以及此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國的民族觀念一直都非常強烈。在有爭議的《河殤》這部電視片中，其中一部分就是討論中國總是向內看，看到黃河，看到自己國家內部，從而喪失了在世界上的領導權。所以，從1989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中國不再具有一種中華民族的強烈意識了，而是開始向外看了，開始以不同方式發展自身並加強對外聯繫了。同時，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強規劃，非常強烈地想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在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這種情形。比如，在俄羅斯。所以，僅僅以“全球化”為視角，就可能得出錯誤的判斷，無法瞭解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為何發揮作用。這是驅使我研究這個議題的動因。

我先後寫過兩本論述民族主義的著作。在第一本書<sup>①</sup>中，我所表達的觀點是，我們需要把各種民族主義聯繫起來，包括極端民族主義與日常生活的民族主義。那些討論民族主義的文學作品是會誤導人的，因為它祇關注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其基礎是“我的國家一定比你的國家要好”，這必然導向衝突。其實，民族主義的基礎是民族的觀念，這可以是積極的，因為民族主義可以對民族和民族主權有着建設性的作用，並不完全與侵略或挑戰其他民族相關聯。民族國家體系的世界都是取決於民族主義維繫的民族這種真正組織。所以，我認為，民族主義不僅僅有過度的危險模式，它也是我們思考這個世界的日常生活方式。我還想以中國為例：中國在歷史上出現過一次轉型，時間在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主要表現為，從思考中國歷史觀念中的帝國到思考中華民族的轉變。“中華民族”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包括所有中國人。這並不是一個等級結構的概念，而是“包容”所有人。在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時期，大多數情況下都可以稱為所謂的民族主義。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屬受不同意識形態引導的政治黨派，但兩者都是民族主義的政黨。共產黨的優勢之一是能够對整個民族更具有包容性。從此，中國人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把中國視為一個民族。在整個20世紀和當前的21世紀，中國在絕大多數人心目中被視為一個最基本的民族單位，而不再是一個帝國或者皇帝的臣民。所以，民族主義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正面的積極作用。

我的第二本書<sup>②</sup>是將第一本書的一小部分擴充而來。總的觀點是，全球化實際上有時候使民族變得更有作用了，或者用新的方式來表達。那種認為民族並不能發揮作用的觀點是僅僅從全球合作和全球精英來透視的特殊情況，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民族是相對有作用的。

**郭台輝：**我認為您有兩個觀點比較新穎：一是將全球化看成是誘導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外部因素，但不是決定性變量；二是認為民族主義有着積極的日常模式，並不都是侵略性的。然而，是“侵略性”還是“積極性”，其實是一個相對概念，關鍵是由誰來評判。例如，日本近代興起的民族主義後來擴展為帝國主義，對他們自己來說，依然是積極的；但對於亞洲國家來說，那是一場災難。又如，您列舉的中國的例子。中國人認為，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對內整合資源、對外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積極力量；但對於地方族群和宗教來說，卻可能認為是一種侵略性的、壓迫性的力量，他們也有可能形成一種民族主義力量，旨在反對所謂的文化壓迫與侵略。您是如何看待當前民族主義觀念的？在既有的多民族國家裏，民族分裂主義的動力何在？

**卡爾霍恩：**民族主義、宗教、族群，每一個都可以是整合與分裂的基礎。以中國西藏為例，藏族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以倫理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一些極端人士甚至要求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但佔人口多數的中華民族主義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那也是一種民族主義形式。兩種都是民族主義，但對民族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觀念、邊界與歷史。顯而易見，中華民族主義

<sup>①</sup> Craig Calhoun, *Nation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sup>②</sup> Craig Calhoun, *Nations Matter: Citizenship, Solidarity, and the Cosmopolitan Dream* (Abingdon, Oxford: Routledge, 2007).

得到了民族國家强有力的支持，而西藏並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上沒有合法地位，在國內也沒有合法性基礎，因此，一些人極力訴諸國際非正式交往或者其他國家力量的支援。我的觀點是，歷史上一直存在聯合與分離的階段，在小民族與大民族的邏輯之間沒有本質的差別。所以，族群、領土與宗教都可以用來劃分民族單位。每一種意識形態都可以是分裂主義的，也可以是相互整合的。這取決於政治環境，也有賴於多數民族如何對待少數民族。

如果人口佔多數的民族虐待或者不尊重人口佔少數的民族，他們就有可能產生分裂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最典型的案例是蘇聯的垮臺。在這個大國中，有很多少數族群的民族群體，他們一直極力想獲得某種獨立的國家認同。其結果是：有的情況要好些，有的更糟糕些，有的帶來慘烈的戰爭，更多的情況是仍混合在一起。但這並不是因為小規模的民族國家的情況會更好，而是因為每一個少數族群中都有遭受挫折的人們，他們認為自己在一個更大的結構中無法與別人一起過上體面的生活，他們想在一個更小規模的政治結構中過日子。所以，你就得考慮如何把人們強烈的事業理想融入到一個更大規模的結構中，把諸如語言一樣的東西聯繫起來。因為語言不但是一種整合認同的工具，而且是認同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人們得知為了另一個語言的流通而自己要放棄母語，這就必然造成一種傷害——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會非常痛苦，非常沮喪，就會轉向反抗行動。同時，這也取決於環境。有時候，父母可能認為孩子學習某種語言非常有意義，這樣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所以，地域與環境的不同，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同的。

**郭台輝：**顯然，這就涉及族群認同這個複雜的問題。族群、宗教和語言既是一種導致民族國家分裂的力量，也是促進社會團結的力量，這就必然涉及外部國際環境、內部的制度設計與教育政策。但我們作為活生生的個體，既生活在地方族群、宗教環境中，並用地方語言來交流，又無法擺脫超越地方認同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而兩者之間又無時不存在張力。換言之，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多層認同的複雜結構中。那麼，如何處理好個體認同、地方族群認同、民族國家認同這種多層的結構性關係，或者是個體、社會、國家的認同關係？您與羅格斯·布魯巴克（R. Brubaker）對於民族認同有過一次對話<sup>①</sup>，您似乎在認同問題上與他有分歧。從那以後，您的觀點是否有所變化？

**卡爾霍恩：**我們兩個人的立場都有變化。布魯巴克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之間並沒有很深的對立。他說：“你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呢？我們並沒有什麼不一致的啊？”但我與他之間的確存在分歧，祇是他不承認罷了。這種分歧表現在，他堅持認為個人有優先權，個體認同對社會認同有優先權，所以應該討論差異性認同；我認為，不應該祇討論“認同”本身，因為這裏存在張力與問題。在“認同”問題上衆說紛紜，要擺脫這種混亂是相當困難的。甄別差異不僅是個體主觀的選擇，而且是人們在社會層面展示和經歷後纔能獲得的。所以，你不能簡單地做出選擇並說：“哦，我認同自己是瑞典人。”因為你還需要獲得瑞典護照、簽證這個過程。所以，人們構建自己的認同，關涉到來自外部的强大制度壓力，不僅僅是個體主觀選擇的結果。

布魯巴克與庫珀（F. Cooper）還寫過一篇題為“超越認同”（beyond Identity）<sup>②</sup>的論文，後者恰好也是我的合作者。他們認為人們太過於關注群體，但我認為他們的判斷有問題。因為群體是非常重要的，只不過人們不是以一種正確的方式關注群體。我們不應該

① Calhoun, Craig, "The Variability of Belonging : A Reply to Rogers Brubaker", *Ethnicities* 4 (2003): 558—568; 所針對布魯巴克的觀點參見：Brubaker, Rogers,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s sociologie* 2 (2002) : 163—189. 布魯巴克對此批評還有一篇回應性文章，參見：Brubaker, Rogers, "Neither Individualism nor 'Groupism' : A reply to Craig Calhoun", *Ethnicities* 4 (2003): 553—557

②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1(2000): 1—47.

說個體是第一位的，個體是與群體結合在一起的。有一句古老的社會學名言說得好：“自我與社會是孿生的。”換言之，個體與社會是同時到來的，你不能先有自我然後有社會，你唯有在社會背景下纔成為個體的人，唯有受制於父母、文化以及語言纔能成就個體。語言是最強有力的例子。人們在獲得語言之前不可能成為完整的個體，唯有在語言環境下成長並成為他們自己。所以，個體與社會每一方面都是平等地影響另一方面，並沒有誰先誰後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在盡力解決不同的問題。布魯巴克非常關注的是少數族群的群體，當他們發展出一種強烈的群體認同與團結，當他們祇是作出他們自己的個人決定時，他們就可能遷移到城市並且做不同的事情。布魯巴克真正感興趣的是，個體如何獲得自由擺脫群體的束縛，如何擁有不同的想法。但個體擺脫束縛，外部人仍然把他們看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並且依然說：“哦，你是那個群體的人。”換言之，他們不可能完全擺脫某種群體的身份。

**郭台輝：**在我看來，您與布魯巴克的差異其實不大，與其說是一種爭論，還不如說是一種互補關係，祇是各有不同的側重，或者關注不同層次的問題。您強調個體與群體的共生共存，是一種普遍性的問題，而他側重於個體如何擺脫群體屬性。顯然，這種問題意識來自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浪潮。在這裏，你們兩位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個體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這種流動給個體帶來不同於民族認同的世界主義想象。因此，我並不是很贊同您的全球化進程是一種外部因素的觀點，它其實是與個體的自由追求有着內在關聯的。由此，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就在個體的認同層面上存在一種競爭性的張力。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世界主義得到知識分子的高度關注。在您看來，世界主義是一種現實、神話呢，還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幻覺呢？

**卡爾霍恩：**我覺得三種情況都有。世界主義既是一種現實，也是一種神話，還是一種幻覺。問題在於，我們祇有一個世界，我們應當盡力為這個世界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我們已經遇到很多全球性的問題，比如氣候、金融、戰爭等，我們需要全球合作。所以，這裏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進行全球合作？世界主義表明的觀點是，如果人們把自己想像為世界公民，並且把世界設想為一個整體，我們就必然會思考更多的全球合作。如果存在一種強勢的全球合作形式，那就是以人權為基礎並且對於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們就應該把每個人都視為可以適合這種普遍主義的模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世界公民身份的感知。因為，人權本不是民族的權利，也不是種族的群體權利，只是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權利。所以，從那些意義上看來，這就是世界主義的來源。

我之所以說世界主義祇是一部分現實，原因在於，這對於把自己視為世界公民的人來說是非常平等的，他們祇是少部分有能力周遊世界的精英，而不是一輩子待在山村裏並沒有多少機會外出的普通人。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世界主義的理想與大多數人生活的現實區分開來，而且要問的問題是：誰能得到更多的世界主義呢？誰更傾向於差異化的事物呢？首先，現實是不平等的。其次，目前的現實是，人們依然生活在民族共同體中。所以，說世界正控制在那些傾向於世界主義立場者的手中，這種判斷是錯誤的。雖然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但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是，相互聯繫的世界產生了伊斯蘭運動、基督教福音派運動、佛教慈善組織等，而且每一種都是全球性的，與整個世界相聯繫，但它們彼此之間卻有着很大差異。所以，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產生了各種把人們關聯在一起的多層認同，雖然這些認同不是同時需要或所有人需要或同時出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世界主義是一種幻覺或一種神話。因為，它祇是把整個世界想像成為世界主義，民族國家似乎在消失，我們似乎祇有一個世界體系。



### 三、中國語境中的激進主義問題

**郭台輝：**從您前面所列舉的有關中國的例子，我知道您對當代中國問題有比較獨特的研究。接下來我想與您討論中國語境中的激進主義問題。首先想請教，您是如何區分“民族”（nation）、“種族”（race）、“族群”（ethnicity）這三個概念的，因為這三個詞進入中文語境中就很難區分了；您又是如何劃分民族、種族、族群這三種範疇的？

**卡爾霍恩：**準確地說，“民族”、“種族”、“族群”這三者在運用時是不應該相互轉換的，但三者的確存在着較強的關聯度。在19世紀晚期的中國，這三者的聯繫更為緊密。

“種族”概念是一種來自西方的舶來品，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當時日本人恰恰是用“種族”概念來看待中國的。中國在古代是不用“種族”觀念來思考問題的，但在近代卻成為理解認同的新思維、新方式的一部分。“種族”與“種族主義”總是聯繫在一起的，從來就不存在一種“中性”的種族，人們習慣於如何把其他人歸類到某個種族的範疇中。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所有非洲人都是一個種族呢？世界上最高的與最矮的人都在非洲，他們彼此之間的差異非常大，難道我們沒有注意到他們分屬不同群體嗎？中國自身所做的一個重要的種族區分，就是盡力把漢族作為一個在種族上的不同群體以區別於其他群體。這個問題相當複雜，因為中國的歷史非常漫長，相聯繫的兩方面在於群體同質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他群體的對立。所以，從來沒有一種種族觀念不是從對立面建立起來的，也沒有這樣一種意識形態。

“族群”指向的是群體劃分的文化模式。比如說，如果我們提到漢族人，這是一個種族嗎？或者這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差異嗎？或者是以語言與文化來區分這些人的嗎？答案可能每一種都有一點，但更可能是文化與語言，不同的群體在其他情境下都是一樣的東西。所以，民族主義與族群是一種語言、文化和政治概念。

“民族”是通過把文化與國家、政治關聯起來纔能轉換成的現代形式，“種族”則是一種構建起來的觀念。你可以把種族整合起來，一旦整合，它就成為一種思考種族的認同。這種認同的擴展是與歐洲對世界的殖民化聯繫在一起的，是歐洲人看待世界上的非歐洲人的一種方式。例如，歐洲人構建和想象的“蒙古人種”（Mongoloid），就是把蒙古人視為理想而典型的亞洲人。但中國人從來不認為蒙古人是典型的亞洲人，蒙古人只是不同於中國漢族人的北方民族。然而，對於我這個局外人來說，就從中有了這種觀念：所有這些亞洲人都長得一個樣子。但對於亞洲人來說，他們是不一樣的，因為漢族人與來自北方的蒙古人在長相和風俗等方面有着巨大差異。這些區分是歐洲對世界範圍的殖民主義留下的遺產。顯然，歐洲人並沒有導致亞洲人在生理上的差異，但他們卻對生理上的差異進行分類。我們可能會說，“哦，存在亞洲人種，蒙古人種，中國人種”；我們還可能說，“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人種”；或者說，“中國有五十六個人種”。這種說法不一的分類，對於政府的管理者來說，可能就變成一件很敏感的事情了。

政府的管理者對此敏感基於兩個理由：一是他們知道，在某些方面，在某種外部情況下，這也許是一個問題，他們不想被人視為消極的種族主義者。二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人們一直非常重視統一，認為中國本質上就是一個統一體，分裂是一場災難。所以，即使政府管理者頭腦中有一種少數民族的觀念，人類學家們也在大學裏研究少數民族，但他們都一致強調把每個人視為中國人——不僅漢族是中國人，其他少數民族也是中國人。政府出臺的政策和措施就要盡力顯得有包容性，盡力做好團結工作，但完美地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總之，“種族”是一個非常難纏的觀念，因為種族意識形態的客觀基礎是生理上的差

異，但社會關係和政治國家面臨的現實問題是，雖然有生理上的差異，又不能完全根據客觀的標準來劃分差異的界限。這遠比我說的複雜得多。

**郭台輝：**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過幾次學潮，最出名的大概就是1989年的“六四風波”了。它不僅與全球化、蘇聯和東歐的社會變遷有密切的聯繫，而且是中國百年來自身的激進主義傳統的某種延續與變形。作為社會理論家的您，對中國有一種別樣的關懷，因為您在80年代曾多次訪問過中國，並且把這種經歷與您的歷史社會學方法、激進主義主題三者有機結合起來研究。您能談談80年代您在中國那段經歷嗎？二十多年之後，您對當時關注的主題與核心觀點有哪些修正？

**卡爾霍恩：**我在1984年就到過中國，並且對中國一直充滿着濃厚的興趣。在70年代，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想去中國大陸做實地考察，但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時候的美國漢學家們祇好在香港和臺灣做研究，這大大限制了漢學家們研究的主題、方法與材料。在80年代，我們開始有機會去中國大陸旅遊，我還獲得了往返多次旅行的資助，幾次在中國度過了整個夏天；更重要的是，1989年，我獲得了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一年的機會。對我來說，那段親身經歷，至今難以忘懷。但那時我有自己設計的學術理想，因為我始終想寫一個有關20世紀中國激進主義的比較歷史研究。我一開始的興趣是集中在五四運動這個典型的激進主義，而不是當時的中國政治或社會。

1989年之後，中國的經濟、政治與社會迅速發展，很多事情的發展之快超過我的想象，而且，中國有些變化的確不是那時候的學生群體在運動中所訴求的，而是遠遠超過了他們的訴求。從1992年開始，中國開始加快改革的步伐，這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祇不過，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與西方所預期的道路迥然不同。雖然當前中國也出現了許多社會抗爭，但與1989年的那場“風波”是完全不一樣的，起碼抗爭的主體不是學生。許多抗爭來自於農民、工人以及其他不一樣的社會群體，但主要不是那些有着特殊訴求的學生群體。不過，兩個階段的抗爭有着相似的指向，那就是腐敗問題。腐敗是導致人們走向抗爭的最大不滿。其實，我們還可以與“文化大革命”運動相比較。換言之，在“文革”期間、1989年的學潮以及如今的社會抗爭之間有何差異和共同點？這些抗爭模式是如何變化的？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實際上，我比較樂觀對待中國現階段的變化。可以說，中國近三十年的變化大多數是邁向好的方向和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些方面出現不平衡的發展，尤其是經濟方面的變化與其他領域的變化並不協調。所以，平衡問題將成為中國亟待解決的主題。

**郭台輝：**在您與沃塞斯喬姆（J. N. Wasserstrom）合作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國1989年的學潮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關係。<sup>①</sup>實際上，迄今為止已出版過大量關於1989年學潮的起因與“文革”在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維度的不同聯繫，但在我看來，更有說服力的觀點可能是把1989年的學潮關聯到從1898年的“百日維新”和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激進主義遺產。也就是說，把一個發生在特定時刻的特定事件置於一個長波段的歷史過程中。比如，六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此外，我們可能還要把這個事件與世界範圍在同時期所發生的重要事件聯繫起來，看看這場激進主義的“傳染病”是如何區域性地蔓延和傳播的。換言之，把1989年的學潮放在一個時間與空間構建起來的虛擬坐標系中，進行時間與空間的雙重或多重比較，這樣纔有歷史意義與世界意義。這樣纔能真正落實了歷史社會科學的目標。那麼，在您看來，中國20世紀的激進主義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與西方的激進主義傳統相比較呢？

**卡爾霍恩：**我很贊同你的補充。1989年，正好是紀念1789年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那時候，西方出版了大量有關法國其他地方的革命的研究，使得激進主義無論在理論研究、歷史研究

<sup>①</sup> Craig Calhoun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Legacies of Radicalism: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cy Movement of 1989”, *Thesis Eleven* 1 (1999): 33–52.

及其對現實的“瘟疫”般影響都達到了歷史的又一個高峰。而那時候歷史社會學在方法上也獲得了重要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充分運用了你所提及的那個時空相結合的框架。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那篇與沃塞斯喬姆合作的文章之所以祇是認為“文革”與“六四風波”有着諸多關聯，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需要認識到“文革”的確存在“民主”的陰暗面及其在“後文革”時代的暗流。我們應該更廣泛、更深刻地譴責這種陰暗面，還要深刻揭露所有被濫用的民主及其問題。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這兩個個案都是學生關注或不關注現代中國走過的沉重歷史。人們在每一案例中都可以看到許多在描述1949年或1919年的電影中可以看到的歷史記憶。他們給學生灌輸的觀念是：“瞧，這就是我們要堅持的反抗歷程。”但這恰恰卻產生了意外的、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表現形式是相似點所在，每一個事件都有各種儀式，但都彼此關聯在一起。在許多方面，由於沒有很好地化解學生與民衆對腐敗現象的不滿，沒有深刻地反思對“文革”運動的操縱，這是導致1989年動亂的主要原因。

至於未來的激進主義，我認為存在多種可能性，有些是非常危險的。比如，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與對抗，有可能會分裂或顛覆中國。又如，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城鄉差異問題，有些地區更多得益於經濟與通訊全球化的影響，有些地區則與全球化沒有太多的關聯，如果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給每一個人都帶來期待和意義，那麼就不可能出現激進的挑戰；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或者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祇給少數人創造發財的機會，那麼就必然讓佔據多數的人們感覺到沒有進步或沒有受益，這將摧毀這些人繼續服從法律的信念。再如，污染問題、健康問題以及社會保障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不少人就會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就會導致一種追憶“文革”的相思病。這就是薄熙來在重慶一度成功操縱意識形態的原因。薄熙來並不是左傾主義者，而是一種以奇怪方式出現的保守主義，利用了左傾主義的想象和象徵主義。這具有潛在的社會政治威力，一旦得逞，中國必然會產生比蘇聯垮臺更大、更激進得多的問題，給中國歷史和人民帶來難以想象的災難。中國政府在處理薄熙來這件事方面表現得非常謹慎，也處理得非常恰當。從世界範圍看，如果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的狀況對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未來發展機會與夢想有所阻礙的話，他們必然會對過去的生活產生更大的懷念與鄉愁。

**郭台輝：**最後，我想問你兩個私人問題。您的受教育背景和學術生涯是在美國與英國之間流動的，這些年您還與世界各地杰出的社會科學家建立了友好的私人關係網絡，您能談談自己的學術軌跡嗎？您是如何成功維持那麼多學術聯繫又保持那麼高產的研究成果的？

**卡爾霍恩：**我的學術關係主要是在美國，也有一部分在英國與歐洲大陸。部分原因在於，我的不同的研究主題和方法與那個地方的學者的關注有着親和力。比如，認真看待比較與歷史問題使我與英國及歐洲大陸的學術圈建立了聯繫。我一直在思考，美國社會學與許多國家的社會學一樣，太過於局限於自身內部的研究。如果我們能够從多重視角考察不同的國家，比如英國、法國、中國以及其他地方，或者看待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那就最好不過了。我早年的學術生涯在社會理論和歷史社會學之間就確定了各種聯繫，而今兩者已經發展成為兩個領域，但我更有意識地在歷史與社會學之間、社會學與哲學之間建立跨學科的聯繫，還把文化、心理等各方面也關聯在一起。而且，研究對象在本質上就是相互聯繫的，祇不過19世紀之後學科分化太嚴重，我們現在需要有意識地彌補這種缺憾。所以，對於我來說，民族之間的各種聯繫從來就不是區分事物的首要標準。我的研究有時候關注社會運動多一點，有時候關注社會理論多一點，或者不同階段側重於不同的問題，主要特色在於不同學科知識之間的穿梭以及不同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我的研究主題不斷變換的原因，主要是社會大眾常常質疑不同的問題。這是影響我重點關注與選擇某個主題的關鍵，也促使我這個社會學家思考不同的外界事物。